

经济纵横 顾清扬

为什么世界发展需要“一带一路”？

基础设施未必是发展的充分条件，但绝对是必要条件。国家发展的落后可以归咎于很多原因，但基础设施的匮乏绝对是第一位的因素。基础设施的不足阻碍了产业和城市化的发展，也无法从区域和全球贸易中受惠。特别是一些陆锁国家（Landlocked Countries），他们进行经济发展和国际贸易的物流成本非常高昂，也只能与邻国进行有限的

国际贸易，因而在经济发展上呈现劣势。联合国贸发会指出，目前全球贸易量的80%依赖海路运输完成，而在发展中国家，对海运的依赖比率更高。

也就是说，通过陆路运输参与国际贸易的比率是很低的，这使得那些没有港口的国家在发展上处于劣势。过去的全球化也显示，获得海洋运输便利的国家发展较快。如何帮助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快速发展和摆脱贫困，并能够参与到经济全球化的行列中，突破基础设施的瓶颈是关键。

但在现实中，基础设施的不足一直是长期困扰发展中国家的难题。为什么发展中国家不能在短时间内迅速形成基础设施的能力呢？主要是基础设施大多具有准公共物品和较少具有排他性，因此，由私人市场建设要么是不可能，要么就是建设的数量严重不足。因为私人市场无法得到有吸引力的回报。但基础设施建设是具有强大的正外部性的，没有充沛的基础设施，高质量的发展无法实现。基础设施的独特属性，需要政府起到主导的作用。尽管人们探索了很多融入私人力量的创新方法，但政府的作用仍然是无法替代的。

不幸的是，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在资源的集中能力和资本的充足性上都存在很大的问题，难以担负起上述重任。亚洲开发银行就估计，大部分亚太地区国家的政府只能提供基础设施建设40%

“一带一路”建设，特别是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会改善发展中国家的能源和物流的供给能力，促进经济增长和收入的提升。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即南南贸易，会相应提升。这种横向的南南资源流动，会为经济全球化提供新的方向，并与之前的纵向的南北走向的循环相互补充，丰富全球化的内涵，也有利于全球贸易的平衡。发达国家的高质量产品和技术出口也会随之增加，实现全球的互利共赢。

的资金需求。二战之后，各类多边发展银行相继成立，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发展中国家的困境。但这些发展银行的资金总量和项目实施效率，仍远远不能满足发展世界的需要。

中国在发展基础设施方面相当成功。通过产业园、经济特区、电力、交通等一系列基础设施的先行建设，中国经济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中国不仅积

累了雄厚的资金，和在各种自然环境下基础设施的施工能力，更主要的是，中国独特的经济体制和政府强大的资源调动能力，使得她在发展基础设施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特别是在大型项目和跨境项目建设方面。

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加入全球基础设施建设行列，这为全球的发展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中国采取独特的财务模式，在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拉动其设备和贸易的出口，后者的盈利可以弥补基建项目本身的低回报，从而使得项目在整体上是财务可行的。这种考虑综合收益的模式解决了过去建设单个基础设施项目回报低的难题。

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也为经济全球化注入了新的活力。过去的全球化，主要是资源南北流向的全球化。发达国家大多地处北半球，他们凭借技术、资金和管理优势，向南半球的发展中国家派发订单。南半球的发展中国家在自己的低成本优势的基础上进行加工生产，再把所生产的消费品出口到了北半球的发达国家。但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极大地影响了发达国家的购买力，加上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使得上述南北纵向的经济循环受到影响。

“一带一路”建设，特别是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会改善发展中国家的能源和物流的供给能力，促进经济增长和收入的提升。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

易，即南南贸易，会相应提升。这种横向的南南资源流动，会为经济全球化提供新的方向，并与之前的纵向的南北走向的循环相互补充，丰富全球化的内涵，也有利于全球贸易的平衡。发达国家的高质量产品和技术出口也会随之增加，实现全球的互利共赢。

当然，“一带一路”建设在实施中必然会遇到许多困难。如何保持好国际地缘政治平衡？如何加强全球利益相关方的沟通和战略协调？如何吸引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加入到“一带一路”建设？如何更多地引入私人资本和私人企业？如何实现财务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如何根据发展中国家的多元化需求来提供适度够用的基础设施供给？这些都是决定“一带一路”成败的关键。

我们看到现有的“一带一路”的讨论，大多聚焦在国际地缘政治的角逐。不可否认，尽管中国将

“一带一路”定位于互利共赢的经济发展平台，但随着“一带一路”的推展，中国的软实力和影响力必将增强。但如果中国的倡议能为世界的发展做出贡献，那么她的影响力的自然增强又有什么值得非议的呢？

美国二战后，通过马歇尔计划为西欧复兴做出了贡献，而美国是得到了相应的回报的。我们也应该以同样的心态认可中国的贡献。换一个角度看，我们能找到一个替代“一带一路”的更好的方案吗？发展是全球面临的首要挑战，一切贡献于全球发展的努力都应优先考虑。大国和区域间的博弈，应该让位于全球的发展，这应是改善全球治理体系的首要原则。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副教授，本文发表于“思想中国”（ThinkChina）